

建议习近平主席辞去党政军一切职务

致政协主席汪洋的公开信

尊敬的汪洋主席，您好：2012年前后，我感到我们共产党面临的形势不太好，反复思考之后，2012年9月给胡习二位主席写了一封公开建议信，表达我的忧虑。在那封很长的信中，我建议党中央携手“中华民国”以“联邦制”为框架，创建“中华联邦合众国”，以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从而统一国家。这个“中华联邦合众国”就是毛公追求的“联合政府”。毛公的思想分“独裁”和“民主”两部分，“民主”思想应为其主体，所以毛公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我建议以“联邦制”为框架，创建“中华联邦合众国”，完全符合毛公的民主追求。我的建议，胡习二位主席看好，让我去政协履职，操办此事，非常感谢习主席重视我的建议。由于当时个别常委不同意，最终将我的建议搁置。这是我在网上看到消息，现在还可看到。当时，如果我的建议常委会一致认可，党的18大，会是另一个样子，习近平当了总统，国家统一了，民主降临了，民众生活在民主的阳光下，共产党带着满身的荣誉，退出历史舞台，安全软着陆，八千万党员都安全了，该多好，就不会出现今天的这个局面。

近几年，形势有些进一步的恶化，台湾问题、少数民族问题、香港问题、“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等都没有处理好，做成了夹生饭摆在那里，没想到又出了个武汉瘟疫问题。现在中国面临的形势，严重到令人难以呼吸的程度。我想再写公开信，表达一点意见，就上述问题提点建议。

一，当前的严峻形势，表明习近平主席必须辞职，以退为进，这是应对危局的上上策。2020年的春节，上天突然发布“大写意”即：用新冠肺炎，以武汉为起点，首先扫荡武汉和中国，然后扫荡全世界。上天的这一手太狠，一下子把中国国家主席在客观上摆在对世界的对立面了，要中国国家主席对瘟疫的流行“负责任”。现在整个世界携起手来，要问责中国主席，可以理解。已有美、英、法、德、意、印、埃及、西班牙、尼日利亚数十个国家，以各种方式向中国提出索赔，索赔的数额据媒体目前的显示是350万亿美元。吓人呀！问责的后果就太严重了，不可预料。那么我们怎么应对呢？我们是和整个世界对着干吗？我们决不承担任何责任吗？我们死扛、硬顶吗？我不怕你们世界统一战线！？极左媒体人摆出一副二愣子的做派，好吗？甚至用所谓的“爱国主义”和“忠于共产党的伟大誓言”，把14亿中国人绑架起来，一起向国际反动派进行斗争到底，直到把14亿中国人拖入核战争？如果中央上层是这么思考问题，那就说明中央高层政治上太幼稚了，对人民对国家太不负责。这是因为，孤立的中国，面对的是全世界的挑战！我们没有一个朋友，只有朝鲜那个包袱。再则，我们的硬实力目前还比不过人家。如果打核战争，中国占不了上风，恐怕是万劫难复。所以我认为：极左对抗，不是好策略，更不能搞战争。我们的最高策略应是让习近平主席以身体不适为由，辞去一切职务，暂时避开锋芒，以退为进，机会到来时再出山，当总统。能上能下，是成熟政治家的风范。邓小平几

上几下，照样伟大，那是政治上成熟、老辣、稳妥的表现。如果国家主席辞职了，肯定会减弱国际攻击锋芒，肯定会把对中国的围剿力量减少到最小程度，会产生微妙效果。新国家主席可直接出面接手外交应对，首先国家的尊严会受到尊重，面子不会丢，可直接出面搞弹性外交，有回旋空间，能灵活多变，还可得到全国民众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时间虽不长，但作了大量的有益工作，应充分肯定，存在一些问题，那是不可避免的。人无完人，金无赤足。请求方方面面，上上下下，以大局和高度的责任心为重，为习主席创造隐退的体面的环境，维护习近平主席的尊严。

建议汪洋主席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搞一次政治协商，提出暂退动议，这点勇气您没有吗？这也是您的职权范围里的责任啊！国难当头，临危受命，只能如此了。未来的风险由您承担，这是大局，您耐心一点吧，也许这是个好主意，感谢您。

二，统一台湾问题，唯有采用联邦制解决，才是上上策。

横在面前的事情很清楚，那就是美国打台湾牌。由于美国打台湾牌，这是共产党70年不能统一台湾的根本原因。我们不断呼吁美国不要支持台湾，不要台售，呼吁了半个世纪。美国听吗？不但不听，而且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不断地用立法的形式加强支持。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强力支持，统一台湾越来越不可能。坦率的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民主台湾实际上是支持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美国不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美国对中国帮助最多最大，从来没侵占我们的一寸土地。特朗普总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总统。把美国当敌人是历史性错误。我们要用政治智慧看这个问题，要感谢美国政府对台湾的保护。为了民族的统一，必须创立“中华联邦合众国”。用联合政府取代两个的政权，是对等统一，非常合理。我们不走“联邦制”这条路，不谋求共存共荣，不建立联合政府，想继续一党专政，会断送历史机遇。说得不好听，继续搞一党专政，那只有一条路，等待美国把中国共产党送进坟墓。

一些极左朋友，狂叫武力解放台湾，这是把共产党往火坑推。为什么？武力解放台湾是内战口号，到了21世纪还鼓吹内战，是反人民反国家反民族的。事实表明内战是错误的战争。共产党通过内战建立的是落后的独裁政权，这不很荒谬吗？再说，在经济上，大陆搞了70年的社会主义，结果又怎样呢？结果是，台湾的人年均收入是大陆的五倍，台湾的社会福利世界排名第二，大陆的社会福利世界排名第159。我们不惭愧？政治上经济上台湾都比我们先进、富足，极左朋友叫喊武力解放台湾，是不是在帮倒忙？！说句幽默话，应该请台湾来解放大陆，才合情理。极左无知的“武统论”必须休矣！

三，少数民族问题，一直未解决好，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高招，只能是联邦制。在中国历史上，自从出现了大汉族之后，就出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矛盾，出现了民族歧视。这种歧视的根源产生在对少数民族的错误认识。历史上把少数民族叫蛮人或蛮夷即没有文化、思想落后的野人。他们被从中原地区驱赶到了边远山区，不让在中原地区生活。对少数民族的一切歧视，都由这种错误认识而来。打压少数民族，是历朝的基本政策，直到民国时期一直都是这

样。我们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和过去比，有很大的进步。首先在思想上确认各民族一律平等，少数民族是大家庭的一员，国家的主人，在组织上实行区域自治等。那么为什么民族矛盾还是那么尖锐，而且愈演愈烈，一片血腥，不可调和？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是自治问题。我们说是自治，实际上没有自治，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因为自治区第一把手即党委书记，一律都是汉人，这不能叫自治。这一点，一直遭到少数民族的非议或反对。但共产党始终坚持汉人当家。这是国家和少数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根本原因。二是，在暴发矛盾冲突的时候，往往采取暴力手段，开枪弹压。镇压手段愈来愈严厉，尤其对维族，杀人太多，引起国际上广泛关注。民族矛盾愈来愈尖锐，说明民族自治区这种管理方式彻底失败，必须革新，寻找新的管理模式。世界上解决民族矛盾或地域矛盾的办法，基本上都是走联邦制之路，联邦制是成功的。中国的民族自治区是个失败，必须停止，由联邦制取而代之。否则民族矛盾解决不了。镇压政策必须立即终止，以怀柔取而代之。

四，香港只有用联邦制解决，才是最高政治智慧。香港在英联邦100年的殖民影响下，从政治到经济、文化及至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殖民形态，并积淀了下来，成了该地区的一种特征。这种地域特征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意识形态的东西形成以后，具有相对稳定性，是很难改变的。如果强行改变，就等于是一场生死革命，会引起反弹。那种反弹的力量不可控，破坏性会极大。今日香港动乱达半年之久，香港人的口号是：守护香港，说明意识形态斗争的你死我活。

邓公提出一国两制非常英明。邓公说，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也不变，符合香港人的利益，对世界对中国都有益。既然邓公说了五十年后也不变就不应该变，以前的香港是什么样子就应是个什么样子，保持原样，才能保持繁荣。否则，牵一发动全身，繁荣难以保持，大陆的战略利益必然受损。

为了大陆的战略利益，“联邦制”比一国两制好。应该看到，邓公的一国两制是个好东西，但这个一国两制也不是成熟的理论，也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是在和铁娘子发生争执时邓公拍脑门的产物。一国两制虽然临时解决了香港必须按时回家的问题，立了大功，但留下了两种性质绝对不同的社会制度融合于一个政府中的许多矛盾。这种矛盾是你死活的，不可能和谐相处于一个政府之中，必然会产生碰撞并爆炸，在碰撞碰撞22年以后，终于爆炸了，把个经济繁荣的自由港炸了个稀巴烂。欲重治香港，必须停用一国两制，用联邦制取而代之，废除23条基本法，由香港人成立“中华联邦香港临时自治州政府”，先独立起来，制订“香港临时宪法”，恢复昔日自由港的容貌。要达到此目的，唯有走向“联邦制”。

五，目前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项目是发展农业经济。

“三农问题”比较严重。前30年的农业政策，是急躁、冒进，结果是把传统的良好的农业结构统统破坏了，农业被搞的一团糟。后30年的农业政策，是修修补补，结果是越修越漏，农村景况令人深忧。总之，70年的什么“农业发展计

划”、“纲要”、“方针政策”、各种“措施”等等，实践证明，统统是不对路的，失败的，造成破坏性结果很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农村的村子，据媒体资料显示：百分之六十的农村，变成了无人村或老人村，百分之四十的可耕熟地被荒废，无人耕种了。这不是很严重吗！？近几年，中央不断调整农业政策，还是不凑效。下一步怎么办？一句话，中央头们找不着北。

难道“三农问题”就解决不了吗？能解决。关键是政策要对路。只有制订有针对性的科学政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我认为，要做两件事，实行三项政策，可以解决“三农问题”。

做哪两件事呢？一是实行土地私有制，耕者有属于自己私人的土地。唯有如此，农民才会认真干活，这一点简单小道理，多少年来，中央高层却硬是不懂。二是把两亿五千万打工仔一分为二：一半留在城市，给予户口，变成市民，不再一心两头，安心在城市，当好市民。另一半返回农村，以农为职业，安心农业生产，不要老远去打工，在本地打工。

有三项政策可以吸引、解决打工仔们分流后，会各自安于职守。

在农村推行**第一个政策：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搞“亩产达标计酬法”**。这个办法等于向农民按月发工资。国家公务员和工人都拿月工资，农民劳动在田间，也如同上班，而且农民的劳动成果更实在，是社会必须产品，农民只有拿工资，才体现时代的正义与公平。否则就是一万个无正义，不公平。例如农民累死累活生产的粮食为什么要那么便宜卖给市场，不合理，一万个不合理，如果农民拿了工资，这个不合理的问题就解决了。

“亩产达标计酬法”具体办法。1，土地是私有的。2，每亩的产量（如水稻，任何作物都可以采用此法）达到了当地的标准例如1000斤，市值每斤1.5元，价值1500元，这1500元就是你的月工资，一年则18000元。超过亩产，另外发奖金。这是一亩地的年工资。2亩地则是36000元。3亩地则是54000元。10亩则是180000元。这1000斤水稻，你留足口粮，其余上交国家。关键是要亩产达标。你一年种10亩水稻，每亩都达标，一年你就开始富起来了。土地越多，收入越多。你除了种水稻，完成本职工作，还有大量时间干别的事，进一步增加收入。我相信，实行这个政策，会有两个后果，一是农民抢土地，不再抛荒。二是拼命劳动，种好庄稼，力争亩产达标。这个办法可把国家的粮食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政策，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发展“农场经济”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第一个政策是小农经济，目的是让农民先富起来。第二个政策是建立土地私制基础上的大农经济，国家希望之所在。具体办法是：1，国家划拨发展基金。2，农场的办场方针，以发展农业为主，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3，农场的土地使用原则，百分之九十五用于生产，盖房使用面积只能占百分之五。4，必须使用本地区本省劳动力，保证农民就近打工就业。劳动力有缺口，则可招外地外省农民工。这个政策不仅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也解决了铁路春运的困难。

第三个政策，农村不能走向城市化发展的路子，大城市的问题太多，不宜人居，应发展“店”“铺”经济，进一步扩大就业机会，提供振兴农村之路，建立田园化的世界东方的农村。在施实了上述两个政策之后，估计农民就有钱了。有了钱的农民，必然有建立他们事业的要求。满足他们这个要求的最好办法是恢复过去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砍掉了的“店”和“铺”。五里一店，十里一铺，布局合理。“店”和“铺”最先出现在汉代。“店”和“铺”出现以后，千百年来，一直是农业经济发展的中心，在这个市场上，农、林、牧、副、渔等产业都有，而且还有文化产业和卫生医疗事业，是文人墨客汇聚文地，是农村经济、文化的中心，不仅担负着发展农业，振兴农村的任务，而且是广大农民精神寄托之所，成为农村庙会的中心。把“店”和“铺”发展起来，农业，农村，就发展起来了。

我们应鼓励城市的大企业家，拿出部分资金，在农村去投资“店铺经济”，发展“店铺经济”。“店铺经济”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可为。有了钱的农民，也必然会在“店铺经济”这个地方去扩大他们的资本，除了打工劳动所得，到店铺那地方去扩大资本，是农民发财致富之路。

“店铺经济”发展起来，农村就活了，农民就有了奔头。“店铺经济”是中国的希望。

实施办法。最后我要说明的是，“联邦制”这个方案的实施，必须由一个纯民间组织来执行。这个纯民间组织最好叫《中华民族大联合委员会》，由各界代表50人组成，由其中5人组成执行委员会。这个《中华民族大联合委员会》纳入政协领导之下，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必须是茅屋良民，路边小草，正直公道，心怀民族统一之大志者。不许可有任何官方背景或裙带关系参与其中，暂且只好委曲他们退避三舍。我愿领衔这个组织，竭诚以《中华民族大联合委员会》的名义为国家效力，以公平、公正的原则工作。以上所述，不妥之处，请指正。

原中国人民大学（分）政治系主任、教授冷杰甫2020.4.29